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ink and light color, depicting a river or lake flowing through a valley with distant mountains and small trees on the banks.

海瑞

清官意识的政治 哲学探析

贾玉明 著



科学出版社

海瑞清官意识的政治 哲学探析

贾玉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从“至公”“至正”“至廉”“至明”等四个方面来阐述海瑞的生平及其清官实践;第二章从“圣贤教育与修身立德”“崇尚王道与忠君爱民”“刻苦自律与疾恶如仇”等方面阐释海瑞清官意识产生的内在因素;第三章从“儒家文化与士阶层的清官意识”“王权体制与清官现象的政治空间”等两个方面论证海瑞清官意识产生的外在因素;第四章从“清官意识的社会价值”“清官意识的局限”等两个方面论述清官意识的得与失;第五章从“从民本到民主”“从忠君到人本”“从清名到奉献”“从‘内圣’到‘外王’(移风易俗的制度建设)”“从执著到圆融”“清官意识的现代价值”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清官意识的现代转换。

本书可供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对本领域感兴趣的人学习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瑞清官意识的政治哲学探析/贾玉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11
ISBN978-7-03-046381-4

I. ①海… II. ①贾… III. ①海瑞(1514~1587)—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K827=48 ②D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5887 号

责任编辑:赵 鹏/责任校对:胡小洁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梨 园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3/4

字数:230 000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海瑞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被后人誉为“海青天”“南包公”，然而关于海瑞的历史评价，不同时期褒贬不一，甚至因“海瑞罢官”历史剧的上演都曾引发的悲剧。这使得海瑞这个清官多少带有几分争议和神秘色彩。我对海瑞的研究，努力避免单纯地去辨析海瑞为官的功与过、是与非，更多的是带着对清官的敬佩、传统政治哲学学习的兴趣及工作实践感悟来探究清官文化，思考当今背景下如何汲取清官意识中的有益营养，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我作此书，可谓机缘有三：一是个人成长中对“海青天”的感佩和好奇。从小通过影视作品接触“海青天”，对海瑞这样的清官充满无尽的敬佩。后来慢慢了解到海瑞生前仕途跌宕起伏，死后几百年又被人牵起诸多是非。后来有机会平静客观地研读《海瑞集》和相关史料、传记，对“海青天”清廉刚直人格的敬仰更是跃上心头，愈发引起对这个传奇历史人物的浓厚兴趣，萌生探索研究之意。提笔之前，有幸能游览千岛湖龙山岛，瞻仰海瑞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均赋税，除陋规，平冤狱，四载辛苦，小邑山高铭德政；恤黎民，抗权贵，谏帝王，一生刚直，大江水涌颂清官。”上联讲海瑞在淳安为官四年的主要功绩，下联是海瑞清廉不阿为民请命的生动写照。在此我沉吟良久，万端感慨挥之不去：这样一位极富典型的清官形象，仅以各类文学创作的形式加工宣传演绎，而不去从政治文化层面加以剖析鉴别吸收，也是对海瑞清官典范形象的一种辜负。

二是专业研读时导师的鼓励、启发和导引。2008年，凭着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兴趣和偏爱，我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有幸师从博士生导师严正教授。从入学时候起，严老师就为我的选题煞费苦心，考虑我在高校教学研究的经历，以及从事干部选拔管理和廉洁教育工作，认为选题侧重政治哲学角度，会更容易在理论和实践环节产生共鸣，促进知行的有效结合。导师的这种关怀指导与我多年的清官情结不谋而合，顿时产生火花，尤其建议我“以海瑞为例”的线索构思令我情绪激昂起来。随着论文写作的逐步推进，越来越感到对我为学和为政的巨大帮助，也感受到了恩师对我的良苦用心。

三是多年对“清官意识”的思考和感悟。自己多年从事干部教育和纪检监察工作，经常利用古今正面典型的事迹开展对干部的教育活动，也主持编写过由反面典型构成的干部警示教材，“清廉”和“贪腐”两个令人爱憎分明的词汇经常充斥脑海。在民众心中，清官流芳千古，贪官遗臭万年。对这种萦绕在人们心中千百年的“清官意识”如何评判和合理转换，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解读“清官意识”，有不同的视角。从官者而言，是士大夫对“内圣外王”的自身体认，自觉追求，自我实现；对民而言，是把个人幸福、社会公平、国家兴亡寄托于明君、良臣、清官的一种心理情结、价值判断和行为指南。而包含“清官意识”在内的政治文化，成为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倾向，对于政治体系的刚性构架而言，属于“软件”系统，必须深入研究其中的逻辑关联。

这三种机缘的碰撞催生了我潜心探索和研究进而形成今日的拙作。2011年5月该题目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四年来我又不断丰富新的素材，融汇了新的领悟，才有今日的一点点成果。在即将成书之际，我除了要特别感谢给予该书修改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师长、同道，更要感谢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对我几年劳动成果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我还要希望该书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启发读者深入思考道出一点期许。

一方面，“清官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启发为官者的立德修身，包括修齐治平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拯救苍生的思想道德追求，立身仁厚，行事干练，自律严格的君子人格风范等。古人讲“吏者为师”，不是本然如此，必须以私德和政德的完美结合为条件和实现途径。在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化进程中，站在服务人民的立场上，引导领导干部在坚持平等、民主、法治理念基础上，树立何种抱负，具备何种担当，坚持何种追求，形成何种风范，都是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清官意识”与现代政治文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角度，汲取清官意识中蕴涵的有益精神滋养，挖掘提炼积极向上的合理成分，剥离掉附着在传统清官意识中腐朽没落的内容。以此为理论依据，抑制当今政治文化领域不合时宜的思想和现象，启发弘扬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文化，涵养培育契合时代召唤的进步的政治文化。将传统清官意识赋予新的内涵，转换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清官意识”。实现清官意识由“效忠君主”向“服务人民”的转变；实现清官意识由传统“民本观念”向现代“民主理念”的转变，即由“救星”向“公仆”转变；实现清官意识由“勤政忘己、事必躬亲”到“注重政效，担当奉献”的转变。

从此意义上，梳理和剖析古代清官以清正为毕生追求的精神内蕴，以期在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启迪当今，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是值得尝试且必将有所收获的。至于我的粗浅想法有无道理，这些浅显探索有无价值，希望各位专家、读者多多批评指教，不胜感激。

著 者

2015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 001

第一节 清官、清官意识、清官现象 / 002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006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013

第一章 海瑞生平及其清官实践 / 015

第一节 至公 / 021

第二节 至正 / 030

第三节 至廉 / 035

第四节 至明 / 041

第二章 海瑞清官意识产生的内在因素 / 049

第一节 圣贤教育与修身立德 / 049

第二节 崇尚王道与忠君爱民 / 057

第三节 刻苦自律与疾恶如仇 / 073

第三章 海瑞清官现象产生的外在因素 / 081

第一节 儒家文化与士阶层的清官意识 / 081

第二节 王权体制与清官现象的政治空间 / 092

第四章 清官意识的得与失 / 108

第一节 清官意识的社会价值 / 109

第二节 清官意识的局限 / 124

第五章 清官意识的现代转换 / 142

第一节 从民本到民主 / 144

第二节 从忠君到人本 / 151

第三节 从清名到奉献 / 155

第四节 从“内圣”到“外王”（移风易俗的制度建设） / 159

第五节 从执著到圆融 / 162

第六节 清官意识的现代价值 / 168

参考文献 / 174

绪 论

清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可谓由来已久。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官的产生和存在一直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文化土壤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伴随着清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清官主题一直备受文学界垂青，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作为一种重要政治文化现象，清官也一直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关注和议论的重点。同时，伴随着政治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清官意识、清官文化也成为中国哲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焦点。

清官作为一种政治美德，主要与“清廉”二字相联。“清”通常与清高、清正、清明、清平、清贫等词义相联；“廉”则是廉洁奉公之义，通常指士大夫执政活动中能保持廉洁奉公的操守，士大夫应具备大公无私、以民为本、为民做主、以扭转引领社会正气为使命的情怀与品行。“清廉”一词作为传统士大夫所追求向往的人生品格与社会理想风俗，通常包括两个领域，一是个人修身的思想道德要求，二是政治修为的人生价值追求。清明、清高、清贫等美德，一直成为传统士大夫所自豪的赞誉和品性，它通常与“浊”相对，反对的是对财富欲望、功名利禄的追逐，向往的是不计名利、不慕荣华富贵、不贪图物质享受、专注于精神生活的高洁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而在政治上，追求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以民为本、以身作则、为实现王道而不计生死、不畏强暴，将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制，维护社会良俗，作为终身的神圣使命。“廉”相对的是“贪”，贪腐的政治行为完全是对社会秩序和道德风俗的败坏，是一种只顾个人私利私欲，损害国家、百姓公利的行为。当权者如果不能奉公守法，个人生活腐化、穷奢极欲，为官贪赃枉法，不仅破坏政治社会法律秩序，损害百姓利益，而且会败坏社会风俗，进而导致败家亡国的下场。

追求个人品行的高洁、清高，应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公认的美德，而追求廉洁的政治、建设良善的社会风俗，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普遍共识。但是，将清与廉结合起来，将个人的美德修养与社会政治改善结合起来，并将之上升到自我的完善与现实超越、上升到完美的社会政治理想实现的高度，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独特之所在。儒学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人生信仰根源所在，儒家一贯追求

内圣外王的统一，将个人的道德修身与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结合为一个过程，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人生践履活动。儒家文化的这个特性来源于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所形成的宗法社会和宗法政治，在三代宗法政治下，家国同构，个人的修身和道德实践与社会政治是一体的，于是，个人的内圣实现与社会政治的外王理想的落实成为同一个过程。现实超越、道德超越成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特性。

第一节 清官、清官意识、清官现象

对清官的推崇大体上自宋代开始盛行，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清官题材成为大量的小说、剧本、传奇等主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到今天，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众政治心态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官作为从政者的一种赞誉和美德，大体上具有生活清高、清苦，政治上以民为主、为民做主，不畏强暴、力矫风俗的特点。清官的这些特征的养成与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是分不开的。自孔夫子创立儒家以来，就严格地自觉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将安贫乐道、天降大任、任重道远作为儒者的人格要求和道德使命。由此，逐渐形成了士大夫对清与廉美德的自觉认同与追求。

“清”的本义就是纯净而没有混杂物，通常与浑浊、污浊等词义相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被用来指人品德行的高尚，有清纯、清白、清醒、清廉之意，与昏顽、贪腐、愚蠢相对。《论语》中两次提到“清”，一次是在《公冶长》篇中评价齐国陈文子为“清”，但不许其为“仁”；一次是在《微子》篇中评价古代遗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孟子则赞颂殷周之际的贤人伯夷为“圣之清者”，将“清”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德与伊尹、柳下惠、孔子相区别，伯夷因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a，伯夷坚持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因而受到了后世的推崇，这里所谓的“天下之清”与前所言的“圣之清”应该有所不同，不是指个人的美德，而是意指社会理想风俗的美好了。荀子则更多的是从人的认识状态方面来弘扬清的境界，在荀子看来“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因而主张“虚壹而静”，渴望进入一种“大清明”的状态^b。屈原在《离骚》中则表白

a 《孟子·万章下》。

b 《荀子·解蔽》。

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以个性的清白和清醒自居自守。《吕氏春秋·不二》总结先秦诸子的基本主张为：“老聃贵柔，孔子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周礼·天官冢宰·小宰》则提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明确地将“廉”作为政治道德来加以强调和要求。由此可见“清”与“廉”在先秦诸子那里已经成为核心观念。

历代史书中也经常出现以“清”为标准评判赞颂名臣士大夫品格的记载，如：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感叹“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记载，肃宗下诏表彰朱晖“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朱晖之孙朱穆举孝廉，“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他还曾上疏言罢免宦官当政：“愚臣以为可悉罢省，尊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被圣化矣。”《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记载，杨戏作《季汉辅臣赞》，表彰赞颂蜀汉名臣功将，“司徒清风，是咨是臧，识爱人伦，孔音锵锵”“掌军清节，亢然恒常，谏言惟司，民思其纲”“尚书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义，味览典文，倚其高风，好侔古人”。

“清官”一词，在历史上还有一种特指的用法，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指门阀士族所占据的清要之官。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社会的主流，他们垄断了政治资源，社会上门第等级森严，下品的寒门庶族没有机会晋升到上流社会，只能担任底层低级的琐细的职务，而高层的、清闲的、能够很快晋升的清要之职都被上品门第子弟所占据。这个时期，清官特指政事清要、待遇丰厚、升拔迅速的官职，与由庶族、寒族担任的政事繁杂、待遇低下、极难提升的浊官相对。裴松之注《三国志·虞翻传》引《会稽典录》曰：“（虞）耸字世龙，（虞）翻第六子也，清虚无欲，进退以礼，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晋书·何曾列传》云：“嵩字泰基，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宋书·后妃列传》记载孙效上书让婚说：“清官显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魏书·于栗磾列传》引御史中尉元匡奏：“前领军将军臣（于）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很显然，这里所使用的“清官”一词的含义不是本书所论述的主题词所意指的清廉之官，而是门阀士族制度下的清要之官。随着唐代以后门阀士族政治的消亡，清官的这种特殊用法也随之而消失。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清官，通常是指清正严明、廉洁奉公的官吏。与此内涵一致的“清官”一词，最初源于民间对廉洁奉公的官吏的赞颂性称谓。实际上，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官吏奉公守法、廉洁清正，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官吏加以规范。关于廉洁公正的记载由来已久，最早可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

期的典籍中有所体现。大政治家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比法更为重要，是“国之四维”，成为传颂至今的人生纲要。上述所引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所记载的“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旨在考察官吏的综合表现和素质，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计”为衡量标准，而又突出考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a

儒家的政治理想乃是一种道德理想政治，其对执政者的道德修养和操守有着严格的要求。儒家的治国逻辑就是统治者自上而下，以身作则，实现道德风俗的完美，维护完美的礼制。因而，儒家对弟子学习和执政过程中的道德操守予以十分突出的重视。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b那么统治者如何正身呢？那就必须要克己复礼；儒者如何修身呢？必须要克服功名利禄的诱惑，经得起贫富穷达的考验。孟子强调儒者要有“天降大任于斯”的情怀，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c孔孟所开创和弘扬的儒者道德操守，对于后世士大夫的政治道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汉代，国家明确地将察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常途。所谓“孝廉”即在家孝悌和从政清廉之士。自此之后，孝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士大夫公认的政治美德。在二十四史中，虽没有明确地将“清官”作为列传的名目，但意指或意近“廉洁奉公的官吏”的列传中却有“循吏”“廉吏”“良吏”“清吏”“清白吏”“直臣”等提法，如《史记》专设《循吏列传》，并为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等所承袭。《南史·梁本纪中·武帝下》载：“（梁武帝）诏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用”，这里的“清吏”已初具清官的意思。而《南史》列传第六十《循吏列传》中记载丹徒县令沈嶷之的事迹更非常鲜明地揭示了标榜为官之“清”，“嶷之吴兴武康人，性疏直，在县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润日至，遂锁系尚方。叹曰：‘一见天子足矣。’上召问曰：‘复欲何陈？’答曰：‘臣坐清所以获罪。’上曰：‘清复何以获罪？’曰：‘无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为谁？’嶷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诸贤皆是。若臣得鸣，必令清誉日至。’嶷之虽危言，上亦不责。后知其无罪，重除丹徒令。入县界，吏人候之，谓曰：‘我今重来，当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清官的精神风范可概括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四个字：清、正、廉、明。清者，清白、清高、澄澈、洁净之意，通常指士大夫自身廉洁自律，通仁识礼，不为纷繁复杂的外物迷惑，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重道德操守和道德养成，严于律己，关

a 《周礼·天官冢宰·小宰》郑玄注。

b 《论语·颜渊》。

c 《孟子·滕文公下》。

心百姓疾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者，正直、正派、公正之意，具体表现为为人方正、坚守原则，执政中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一身正气，敢于为百姓做主，据理力争，伸张正义。廉者，廉洁、清廉、简朴之意，在个人生活和执政事务方面表现为高风亮节，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不受贿，不贪腐，不占不义之财。明者，明辨、明察、聪明之意，表现为深明大义，善辨是非，明察秋毫，处事得当。在这四个方面中，清官之清是前提，是核心，是清官得以成名的基础，如果为政不清，即便精明强干、卓有政绩，那也会败坏世风、动摇立政之本。清白是士大夫必不可少的高尚品格，否则何来清官之名。廉是关键，是道德底线，是清官最值得标榜并以此为乐的道德操守。正、明则是风骨，是灵魂，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只是清廉而不正、不明，很难说是好官，更不是老百姓心中期盼的清官了。本书所指之清官就是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清正廉明、奉公守法，广受百姓尊崇的官吏。

清官意识，在本书中是将其定位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政治实践中对“清官”这一形象的自觉追求，是传统士大夫自我实现的一种体现，而不是指普通百姓和帝王对清官的渴望与吹捧。清官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在今天的时代，依然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具体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提倡“为民务实清廉”的为官之道的今天，清官意识同样是我们治国之道的重要内涵，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可供利用和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毕竟清官意识是基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必然会存在不适宜我们今天政治文明建设的局限和落后的成分，因此，要使传统的清官意识发挥其对现社会的应有价值和积极作用，需要对清官意识进行合乎时代的转换。只有通过现代观念的转换，才能使今天的政府官员在现代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的引领下自觉加强对清官意识追求，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清官现象，是指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当今中国，民众和正统文化对清官的推崇、敬奉、渴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和社会心态。整个清官文化，从主体上来看，既包括清官自身，也包括吹捧清官的统治者和百姓。但狭义的清官现象主要是指传统社会底层百姓对清官的渴望、信仰和崇拜。清官现象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特色。它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传统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治，强调君臣的道德表率作用，因而弘扬提倡清廉必然成为传统政治的美德；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的现实又展现为明君少、贪官多，于是，社会政治越腐败越黑暗，无权无势和孤立无援的庶民百姓也就越期盼清官出世，希望有清官能够为民做主，为民除害，解民众于倒悬，拯民众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权力集中于官吏，百姓无权，深受欺凌和压迫，寄希望于清正廉洁的官吏能为自己做主，无形中使得清官故事和清官现象得以千古传颂。作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

的产物，为民做主的清官现象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抵制人治提倡法制的治国理政方略并不是一致的，它与当今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不相适应，更不利于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建设。传统社会的清官意识是奠基于忠君的基础之上的，而传统社会的清官现象昭示的是百姓的无权无能，只有依赖不世而出的清官解救自己。因此，我们应该批判地进行扬弃。我们今天同样要求官员清廉爱民，但是必须要依靠民众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制度的保障来实现。在自由平等法制的时代中，执政者和各级官员才真正体现了为民服务、爱岗敬业的政治道德，才使官员权力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而滥用，不能超越和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力。

历史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正朝着民主、法制、自由的现代社会迈进。而清官意识和清官情节至今还深深留在中国人心里，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的演变起到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作用。深刻剖析清官文化的本质特点，以正确的态度认识清官文化，既不要因为清官所处的时代局限性而彻底否定清官文化，更不能盲目神化清官而将清官文化庸俗化。清官是值得称颂的清正廉明的官吏，清官意识需要经过现代转换，进而为现代政府公务人员所追求和倡导，而清官现象则需要加以辨析，这是本书的基本思想。

海瑞作为传统清官文化的代表，其事迹和传说深入人心。他除了具备传统社会清官的普遍品质和特征外，其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性格尤为突出。虽然其地位卑微，却冒死上疏，犯言直谏，震惊朝野，名垂青史。为官期间，他力主严惩贪贿，平反冤假错案，他本人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恻隐百姓，义愤强权，为国尽忠，为民办事，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深得百姓爱戴。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后对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成为文革发动的序曲，并深深地左右了传统史学的研究以及对清官文化的探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围绕海瑞为代表象征的清官文化，不仅而且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我们检讨“文革”遗毒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都是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因而今天的学术界不仅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文化研究数次成为热点，更为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提供了深刻借鉴。

本书将以海瑞为个案，以中国传统清官意识为主要内容展开研究。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建国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清官问题的研究尚处在学术研究视野的边

缘,研究者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包拯等清官的文学形象进行考证、分析,代表性作品如胡适的《〈三侠五义〉序》^a、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章《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b等。建国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清官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并引起广泛的学术关注和讨论。

清官问题研究第一次成为焦点,并引起学术界激烈争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形成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学者响应中央提出的号召,兴起了一股学习海瑞的热潮。当时中央提出党内人士要树立优秀品质,勇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禁止腐败作风的出现。研究明史的专家学者吴晗就是这个热潮当中较为积极的人士,他根据自己的分析研究,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政论文章,并亲自编写了剧本《海瑞罢官》拍成剧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引发了当时文艺界进而在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进而引发对“清官”的大讨论。《人民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成为“清官”讨论的主要阵地,很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纷纷发表相关言论:王思治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周谷城的《谈所谓清官贪官》、李平心的《漫谈“清官”》等。

在关于历史上的清官是否真实存在,清官究竟发挥了什么历史作用,清官与贪官比较分析等问题上,讨论的结果大体上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倾向性意见。

一是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肯定清官,认为历史上清官是存在的,是有积极作用的,清官要好于贪官。吴晗在《论海瑞》中就指出,海瑞是深得民众爱戴的清官、好官,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并认为清官的精神和品质是值得学习的^c。这是当时肯定清官的代表性意见。此外,还有学者指出,“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阶级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d;“‘清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特别长,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关于‘清官’或类似‘清官’(即‘循吏’或‘良吏’)的记载。不过数量很少,每个朝代只有个把人而已”^e;关于清官的基本特征则总结为:“自奉廉洁”“爱民如子”“振贫扶弱”“断狱如神”“压抑豪强”、“执法公平”^f;在如何评价清官上应该“用古代人自己的标准去看”,“不只是在法令范围内进行剥削这一界限;还有封建道德范围内的行为作标准”^g,在传统的

a 《胡适文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b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c 吴晗:《论海瑞》,载《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

d 星宇:《论“清官”》,载《人民日报》1964年5月29日。

e 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

f 刘节:《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学术研究》1966年3期。

g 周谷城:《谈所谓清官贪官》,载《文汇报》1966年1月20日。

皇权专政的社会里，清官与贪官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压迫轻一点的比压迫重一点的总要好些；剥削少一点的比剥削多一点的总要好些……清官如能利用政治力量，强迫人民兴修水利等事，从而发展生产，未尝于人民毫无益处。……所谓清官，只要能做一点点儿好事，到底比贪官好一点点儿”^a；清官身处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庞大的官僚群体中，虽然同属于统治阶级，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他们往往给封建庙堂起了打扫修饰的作用。……把清官和同代的暴官污吏权奸豪强看作一丘之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a，从本质上来看，清官虽然与贪官一样，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但是清官的确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二是部分学者倾向于否定清官：否定清官的存在，否定清官的历史作用，并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如：戚若文的《揭穿“清官”的骗局》中的说法：“‘清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的一种花招”^b；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清官“既存在，又不存在……相对的清官是存在的……绝对的清官是不存在的”^c，这实际上也是对清官的否定；徐德麟等学者认为，清官是戴着面具的工具：他们“是以不贪的姿态和慈祥的面孔来掩盖残暴的实质……在行动上采取隐蔽实质的形式……在某些方面，起了比贪官更坏的作用”，他们虽然压制豪强，为民做主，甚至是屡次平反冤狱，无私奉献，但是他们在实质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清官”越清廉，越反对贪污和惩治腐败，越有利于封建国家有更多的钱粮收入，实际上就等于对劳苦大众的搜刮剥削保持时间上的延续，“清官”维护封建法制，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更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政治，而不利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清官是一种温柔的陷阱，蒙蔽着百姓的双眼，麻痹着人民的神经，因为“它在今天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连借鉴的作用也没有了”^d。

在关于清官的阶级本质问题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肯定清官者和否定清官者都认同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之一”^e。清官毕竟也是官，“官与民是对立的。他们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对人民专政的工具。”^f“历史上任何一个清官，总是立足于剥削阶级方面为这个阶级的统治机构服务的”，“他（清官）可以成为王朝车队中辘辘辐凑运转圆遂的一个车轮，但是他决不能脱离那个牢牢保持当时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轂轴”^a。

a 李平心：《漫谈清官》，载《文汇报》1966年1月20日。

b 戚若文等：《揭穿“清官”的骗局》，《学术月刊》1966年2月号。

c 施予新整理：《〈海瑞罢官〉与海瑞评价问题座谈会纪要》，《史学月刊》1966年第1期。

d 徐德麟：《清官和贪官》，《学术月刊》1965年12月号。

e 星宇：《论“清官”》，载《人民日报》1964年5月29日。

f 吴三立：《漫谈历史上的所谓“清官”》，《学术研究》1966年第3期。

尽管建国初期学者关于清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基本是在学术层面展开，在学术价值上来看还是值得借鉴的。1966年姚文元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成为清官问题研究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爆发，曾经对海瑞精神加以肯定的吴晗等遭到“四人帮”的抨击和迫害。由于当时极端的政治氛围，包括“清官”问题在内的所有历史学术研究都被无形中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最终偏离了学术的轨道。赞扬海瑞精神被当成为彭德怀翻案的表现，于是清官文化研究变成了彻底的对清官的批判与否定。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开始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实践上的正本清源，“清官”问题再次回到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这段时期关于清官研究讨论，主要围绕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清官的实际作用而展开。这阶段关于清官研究的主要作品有潘仁山的《为清官平反》，历史学家王思治的《再论“清官”》，历史学家苏双碧的《论清官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历史学家冯佐哲等的《论“清官”的历史作用》等。从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清官这一社会现象的肯定态度是一致的。学者王思治指出，清官“并非出自封建统治阶级的虚构”，“古代人民不仅承认‘清官’，甚至加以神化”^a。苏双碧则认为，“清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b。冯佐哲和孟祥才认为，封建社会尽管清官非常稀少，但却代代都出现过，“在两汉到明清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打下了自己的印记”^c。潘仁山认为清官蒙受了不白之冤，应该为清官平反昭雪^d。

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学者的肯定和辨证讨论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既然‘清官’是封建官僚，其阶级属性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人民的‘救星’，但‘清官’在局部地区，在客观上作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因而应该肯定”^a。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清官是皇权专制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清官的道德养成和精神风貌，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好影响。清官的存在，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很多历史上的清官，敢于纠正和叫板昏庸腐朽的政治经济举措，富于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致力于推陈出新，但其思想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受封建皇权的制约，最终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术范式仍然是局限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且带有浓厚的纠正文革时期错误观点的情绪化色彩，影响了学术客观性。

a 王思治：《再论“清官”》，载《光明日报》1978年8月15日。

b 苏双碧：《论清官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北方论丛》1981年第6期。

c 冯佐哲，孟祥才：《论“清官”的历史作用》，《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d 潘仁山：《为清官平反》，《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